

国民革命的转向:《向导》与陈独秀政论趋向

王天根

(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近代政治急剧转型, 报人角色认同极其复杂, 特别是政治家办报。近代国家一政党关系面临重构, 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有其复杂的章程与规范, 在政治权力的攫取与把握上显然有自己的言路及战斗力。国共合作、分裂语境中陈独秀与《向导》的关系, 反映了陈独秀等领导下党报与其时政局变迁的关联, 也反映了共产党走向中国政治舞台中言路的选择。

[关键词]国民革命;《向导》;陈独秀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4)03-0172-09

1921—1927年时值国民革命, 报刊与政党关系复杂。就政治框架的设置而言, 中国政党制度有个兴起到完善的过程, 国民革命后期蒋介石大权独揽, 在政治结构上为党国体系埋下了伏笔。周锡瑞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中称:“国民党组织的列宁主义式结构, 它建立群众组织, 尤其是在青年中建立群众组织的尝试; 党军的建设, 控制文化和媒体的审查机制, 建立国家教育系统并利用这个系统来塑造现代国民意识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尤其是在抗战时); 利用科学对抗迷信, 利用‘中国的民族性’来对抗外国势力将西方标准强加于中国政治与社会之上的企图。”^{[1] 184} 此大体可见政党—国家关系在国民革命中扮演的角色。由此而言, “我们需要对中国政党国家进行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解剖, 捉摸它的习俗的演化, 理解它的话语和修辞, 了解它动员的方法和统治的模式”^{[1] 204}。

所谓党国体系, 就政权的控制而言, 可分执政党、在野党等, 涉及以党治党、以党治国等层面。各政治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喉舌与舆论阵地。报刊政治宣传的成功与否涉及社会结构、行动、话语等。面对欧战和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政局及其逻辑, 思想启蒙者或革命者如何从话语层面唤醒民众, 显然涉及

政治观念及其认同, 而报刊又以什么样的革命话语呼应舆论, 这涉及媒介事件与政治事件的关联及互动。下文以陈独秀与《向导》的关系为中心对此作一分析。

一、中共喉舌《向导》的筹办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语境

五四前后的报刊多与政党政治关联。1921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项英、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施存统、李震瀛、杨明斋、王尽美、陈望道等参会; 邓培、向警予(女)、张太雷、邓恩铭、林育南等12人列席。其时党员数共195人(上海50人, 长沙30人, 广东32人, 北京20人; 其中留俄8人, 留日4人, 留法2人, 留德8人, 留美1人)。大会就“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少年运动、妇女运动、议会行动、加入第三国际等专题作了决议; 通过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选举了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

[收稿日期] 2013-1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代报刊与社会重构中的传媒镜像”(13BXW0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探索”(13AZD168);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项目“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导论”(NCET-13-0642)

[作者简介] 王天根(1971—), 男, 安徽芜湖人, 安徽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新闻传播史。

夏为中央执行委员,李汉俊、李大钊、向警予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 6-9}其时中央领导机构驻上海,1922年10月至1923年2月曾迁至北京。中央宣传部部长为蔡和森^{[2] 9}。中共中央局委员长为陈独秀。

1922年9月13日,中央理论周报《向导》(The Guide Weekly)在上海创刊,为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是中共二大的产物。共产党创办自己的机关报也是共产国际的要求,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条件中的第一条就是“日常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并强调“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3] 41}这在政治原则上规定了中共办刊的路向,但同时强调民众的声音,这从1923年4月11日《向导》周报在头版刊发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可以看得出来。主编由蔡和森担任,李立三回忆称其时中共中央二大后决定停办以前党的机关报《共产党》,而新出一机关报《向导》,并指定蔡和森为编辑。^{[4] 9}据罗章龙回忆:“蔡和森同志主编《向导》是从党的‘二大’后开始的。那时搞编辑工作的人手很少,许多具体工作实际都由和森一人担任。他不仅要写稿,还要做组稿、校对等工作。”^{[4] 60}蔡和森提议罗章龙作为《向导》在北京总发行通讯处的代理人。是年11月罗章龙向邮局办理了《向导》周报的发行登记手续,“这样,从第八期起‘北京大学第一院收发课’就成了该周报在北京的总发行通讯处”。^{[4] 60}

《向导》主编蔡和森为湖南湘乡县永丰镇人,与毛泽东为挚友。1920年8月13日,蔡林彬(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社会主义并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强调,“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5] 51}。是年9月16日,他再次致信毛泽东,重申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5] 63}信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而其时建党组织的核心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致信蔡和森称:“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5] 73}1921年8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4号发表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并附有陈独秀的复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是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致陈独秀的信,内称:“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

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5] 74}蔡和森感到“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从前惟《星期评论》差善),至于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尤其隔膜得很。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5] 79}。陈独秀回信称:“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两者似乎有点不同。”“唯物史观固然含着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5] 80}陈独秀信中虽未提及刊物的事情,但蔡和森后来出任《向导》主编,与此段来往书信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为《向导》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许多重要文章都是由和森与陈独秀亲自撰写。”^{[5] 60-61}

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无疑是《向导》的灵魂。《向导》的出版发行业务主要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承担。是年9月6日《孟邹日记》称:“访仲甫,与我谈商周刊事甚详。”^{[6] 81}仲甫即陈独秀,周刊指《向导》。后陈独秀还致信孟邹之侄汪原放,称:“周报用最好的报纸印四千份,需款若干,请向各印局询明示知”。^{[6] 81}汪原放称:《向导》第1期出版于1922年9月13日。经查对,确实如此。陈独秀与《向导》的关系从《新民国》第1卷第3号第14页刊发的“《向导》广告”中言辞“处在军阀和外力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谁能引导他们向解放的路上去呢?只有马克思派、陈独秀们所办的《向导》周报”可见一斑。

考察《向导》筹办的过程及其根据时局变迁提出的政治斗争口号,可通过《向导》这一刊物自身的历史回顾来看其奋斗历史轨迹。1926年7月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包括《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涉及地方报刊问题,“每月总合报告当地同志对中央刊物(《向导》、《新青年》、《劳农》上的)政治的、理论的、工农的通信共有几篇及其目录(不论是谁做的,各地宣传部都应当报告)”^{[7] 127}。议决案提及“扩大会议认为上届(去年十月)扩大会议的宣传问题的议决案,至今实行的不及百分之一二,中央及各地宣传部是不能不负责任的。同时,那一宣传问题议决案当然仍旧适当,此次扩大会议认为只须规定很具体的办法,以求实行”。^{[7] 128}此说明《向导》的媒介议程设置大体上与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语境中宣传的策略是一致的。

二、国民革命转向与《向导》及 陈独秀的言论立场

中共喉舌《向导》创刊伊始的政治宣传,须面对军阀及蔡元培等倡导的对北洋政府的不合作主义等,亦包括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等的政治主张。在反对直系军阀时期,陈独秀领导下的《向导》称:“本报为鼓动积极的民族革命运动,遂不得不反对当时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和孙中山的直、奉、皖、西南四派提携和平统一之主张。”^{[8] 919}面对共产国际发出国共合作的指令,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讨论国共合作及其统一战线问题。陈独秀与蔡和森等对加入国民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罗章龙后回忆称:“在党的‘三大’上,谈论最多的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有人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主要是陈独秀的观点。他在《向导》周报上还发表过两篇文章,阐明自己的这种看法。”^{[4] 59}蔡和森显然反对这一点。而1923—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的酝酿及启动,中共有其政治立场。1924年4月11日团中央的《团刊》第7期刊发《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称能力较为薄弱或不适宜于国民党某项工作的同志,“不可轻于使之担任国民党各种职员,以引安置私人与包办的嫌疑,同时亦使国民党党务,及国民党对于本党的信任,俱受不良的影响。……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3] 183}这大体上是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及政治底线。

在国共合作的语境中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与此同时,孙中山应邀北上出席军阀会议。针对此,1924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通告,号召各地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展开活动,“即时根据此等要求,设法在当地报纸上宣传,在街市上,在乡村中向民众游行演讲,促起大的示威运动”。^{[3] 240}与此对应的是《向导》刊发陈独秀等表示赞同的时评,实际上起了向共产国际表态的作用。见诸1924年11月1日中央通告第21号《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强调“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3] 233}。大体可见中共中央要求机关报《向导》等在教育同志中发挥重要的政治功能,特别对孙中山的政治行动持支持的态度。

孙中山北上未能取得预期的政治成果。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国共合作随即遭遇重大挫

折。国民党内部分共倾向日益明显。针对此后的政治变局,是年3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共中央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云:“中国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始终表示充分的同情,今后对于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民族运动,仍旧协同全国工农群众予以赞助,决不因中山先生之存歿而有所变更。”^{[3] 325}针对国民党内政治分裂严重、右倾化加剧,是年4月4日,中央通告第19号发表《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的左派力量》,称:“须加紧宣传民族争斗虽然重要而不能代替阶级争斗的理由,并须宣传民族的党和阶级的党使命之不同,使工人群众不至民族主义化。”^{[3] 328-329}此为坚持中共政治立场的基础。

其时国民党内政治派系日益分化。中国共产党支持左派领袖廖仲恺,但他被暗杀。为此,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见1925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为廖仲恺遇刺唁国民党》,强调“廖仲恺先生虽死,廖仲恺先生的革命精神没有死,赞助国民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决不会死”^{[3] 377};与此对应的是中共反对日趋右倾的戴季陶,其政治主张见1925年9月瞿秋白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3] 381-395}是年11月25日共产党与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亦展开斗争。^{[3] 446-447}12月9日共产党又展开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3] 452}事实表明国民党内矛盾尖锐,其反共、分共图谋日趋明显,国共合作遭遇政治危机。为此,1926年2月21—24日,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时局变动,专门涉及“国民党工作问题”,称:“一、以往各地对于民党的工作,都只做了仅仅成立民党机关的工作,而尚没有使这机关去集聚大群的民众,以后应极力注意改正。二、当努力宣传二次大会的成功,宣传广东政府,极力发展左派的群众。三、在与反动军阀帝国主义醒狮派等更反动的势力斗争中,对于右派采用联合战线的政策,去取得他下面左倾的分子,去分散右派下面的群众,去暴露右派首领的罪恶。”^{[7] 33}该文件对中央特别会议也作了通报。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通告第79号称:“最近中央局因下面两个顶严重的问题,在京召集特别会议”,其中一个“是‘仲甫同志应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同时,上海地面反动势力日愈严重,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右派、醒狮派、工贼,各种反动势力互相联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国际来电主张中央

迁移,中央局处在这困难情形之下应赶急设法对付”^{[7]46}。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在《忆往事》中称“陈独秀另租小房子与另一女子同居”,即陈独秀与女医生施芝英同居。后经中央秘书处任作民在《民国日报》刊寻人启事,陈独秀方露面。面对陈独秀未能主持中央工作下的复杂政治形势,中央特别会议“到会同志十二人,计中央委员七人,C. Y. 代表一人,北方区重要同志二人,粤区重要同志二人,开会二天(有误,应为四天),会议七次,自二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四号,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项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量”^{[7]47},即中央机关迁移得以暂停。实际上,国民党右派图谋政治分裂已多有呈现,中国政坛风雨欲来。

与此同时,蒋介石等加速反革命进程。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扣押中山舰并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斯切潘诺夫出席广东苏联委员会共产党分部讨论“三二〇”事件的会议并作报告,报告称“三二〇”事件发生后,“此时汪精卫正在抱病昏卧,闻悉蒋之举动,亦称之为反革命。……23日,汪精卫忽然隐匿,传闻星往医院,而各处均不能寻获”。26日,“寻觅汪精卫未获”。^{[9]149}此见国民党内部斗争明晰化,事态十分严重。与此同时,蒋介石发动了舆论攻势。事变一个月之后,即4月20日蒋介石发表《中山舰李之龙事件经过详情》,称:“凡做党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同志学生,无论他是否共产分子,我看他们差不多平素是最亲爱的、最有希望的同志。这样亲爱的同志学生,现在使得他们完全退出来,这种情形,大家很容易明白,这内容当是种种复杂离奇的,我要讲也不能讲,为什么呢?这是差不多是和法国大革命经过的一段情形相同的。”^{[9]141}蒋介石自辩:“当3月20日事情未出之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我是来革命的,我是要担负革命责任的;如果有人为个人权利之见,想来推倒我,或不满意我,那我是可以退让的,决不肯恋栈一刻的。……或推倒了我之后,就要摇动本党基础,使得三民主义不能实行,使得全军全校同志失去重心,没有人来领导,弄得我们总理辛苦艰难缔造的这个团体,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使得全部同志学生们因为我一个人放弃责任,而不能完成其革命的使命,使得我们学生失去了中心,无法团结,弄得军校出身的同志,任人污辱唾弃,支配一切,而本

党革命光荣的历史竟为我一人灰心而来败坏,这是本校长所更不忍心的”^{[9]142-143}。蒋介石谈话还提及两点:首先,“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础的。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认定现在中国革命的需要,是三民主义,这是无论那一个革命党员,皆能从客观而认识的,所以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而他的环境的需要,一定是三民主义,所以一定要做三民主义工作才行”;其次,“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两个领袖;如果信奉两个领袖,那一定是有一个信仰是假的,或是两个信仰都不真的了”。^{[9]145}针对蒋介石之谬论,6月4日陈独秀致信蒋介石,谈及印刷物《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针对要求共产党退出第一军的诸多议论,陈独秀称:“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何以见得呢?对各军官说共产分子如何如何,当然不象共产党自己的口气,说土耳其杀共产党这段话,我未曾听见共产党人说过,只传闻孙文主义学会中人向汪精卫先生攻击共产分子时,精卫先生说过这样话,其实否尚不可知,即令精卫先生有这段话,只足以证明孙会中人是何等反对共产分子,而绝对不能证明共产分子拟如何倒蒋。”^{[7]102}陈独秀反驳了诸多污蔑共产党人的谰言,称“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够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7]104}。陈独秀重申国共合作局面下国民党要“共信”,也要“他信”,“我反对季陶的意见,已详见给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阅此信,现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个别需要所构成的个别主义之存在”。^{[7]105}

面对广州事变,苏俄驻广州军事顾问、参与筹办黄埔军校的斯切潘诺夫出席广东苏联委员会共产党分部的会议并作报告,作了反省,称苏俄驻华代表“关于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共产主义问题在军

队中之激烈宣传,不尽适当”。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于党务之工作及军队中之宣传亦铸成许多错误,彼等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为转移,只知以显明的扩充共产党为工作之总方针,欲在各处完全把持一切指挥之权,致使国民党因嫉忌而解体”。斯切潘诺夫与陈独秀等皆评价了蒋介石的性格,“关于蒋介石之个性,余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央委员会会长等观察略同,均认为蒋介石为特著(殊)人物,具有特著(殊)个性,其主要之性格则为: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在斯切潘诺夫看来,“蒋氏欲为中国英雄,而又欲利用国民革命运动,因此在右派及共产党之间摇摆不定。彼所谓之‘赤祸’言论,意在迎合中国舆情,因‘赤祸’二字在现时中国为大多数所注意也”。^{[9] 150-151}因此,他主张利用蒋介石的性格特点,“吾辈于此时期造成一种不利于发生前事之情势,使蒋氏复与吾辈合作,满足其喜尊荣之欲望,并于吾人协助之中使彼得到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及实力。余所拟定利用蒋氏性格以进行国民革命事业之大略情形如此,职是之故,虽对于蒋氏之政治要求为几种之让步,以为代价亦无可。上海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此间之地方委员会皆同此见解”^{[9] 152}。正是在这一既定的让步策略之下,陈独秀除致信当事人蒋介石外,也在中共党报上化名刊文。陈独秀以“致中”名义在1926年4月3日《向导》上发表了《广州事变之研究》,称:“凡是中国人,都有拥护广州现在国民政府之义务,此次广州事变客观上实有使国民政府倾覆之可能;因此,事变之主动者,无论出于共派倒蒋之阴谋或出于右派倒共之阴谋,都应该受国民及国民政府严重的惩治,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应加以偏袒:这是我们的结论。”^{[8] 988}从中可见面对蒋介石等酝酿分共事件,陈独秀及《向导》加强了舆论警示,但对倒蒋或倒共好像是各打五十大板,意在中立,实际上丧失了高度警惕的立场。

面对风雨欲来,斯切潘诺夫1926年4月所作的报告仍认为“蒋介石、汪精卫二人,仍旧为各方面之中坚分子”,“要之,吾辈之根本政策,厥为与蒋介石联络合作至最后之可能为止”。这代表苏俄对中共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亦同具此目光,而完全赞成此种根本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谓彼离去上海之前,中央委员会亦有此种决议,以为无论如何必须利用蒋介石”。^{[9] 153-154}斯切潘诺夫称:“3月20日之事或足使吾辈灰心,但吾辈当忘却此事,仍旧尽力。”在政治方面,“应巩固国民党之统一,尤须特别

巩固党中之左派而取消右派中之反革命分子”。军事方面,“仍抱定从前巩固吾辈工作及吾辈所建设之各军队、各机关之宗旨,具十分之力量,使军队与现政府及国民党左派坚固联络,与各军官及政治宣传人员接谈之时,应劝以永远忠于党及政府”。^{[9] 156}从史料及其事态发展来看,苏俄专家及共产国际的指导实际上对蒋介石作了妥协退让,陈独秀等大体上接受了苏俄的指导。

当然,作为舆论精英的陈独秀非常关注国民党的报刊舆论,1926年5月1日陈独秀以“实”为笔名发表“寸铁”等系列短文,内有《这是以党治国吗?》,为《民国日报》辩护,称:“广州国民党政府之下的公安局,居然派员检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等,这是以党治国呢,还是警察治党?”^{[8] 1014}此时的陈独秀还在讨论所谓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及警察治党等问题,这无疑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变化。

面对列强与军阀的压迫,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仍将主要精力用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这些时评内容多为评论列强与军阀,而很少看到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危险,甚至蒋介石在广州扣押中山舰发动事变亦没有引起陈独秀足够的重视。作为一个政党的核心领导者,陈独秀缺乏应有的灵敏政治嗅觉。作为舆论精英,陈独秀仍有巨大的政治声望,他亦试图从学理及实践层面分清敌友。1926年5月8日陈独秀在《向导》第152期上刊发《我们要认清敌和友》,还重述苏俄与英、美、法、日对华关系有别,而没有真正面对国共合作面临的巨大考验。中国国内真正的敌人和友人如何区分,陈独秀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在1926年5月15日《向导》第153期上陈独秀发表《南方形势与国民党》,仍宣称:“国民政府所在的两广,不但是南方的革命根据地,而且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据地,全国的革命民众应该出其全力,拥护这根据地。”在陈独秀看来,“反动的右派,在广东因环境的关系,貌为拥护国民政府,貌为和北京、上海的右派不合作;实际上,他们不但反对共产党,并且在军队中禁止阅看汪精卫、蒋介石的演说词,他们在党军始终要团结自己一致的势力”。^{[8] 1025}可见,陈独秀在舆论上仍支持汪精卫、蒋介石,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共合作即将破裂的兆头及危险。1926年5月14—22日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涉及从国民党的规章制度上分共清党,蒋介石在闭幕式上致词称:“我们致力国民革命,固然要统

一指挥,并不是军事、政治的大权旁落。”^{[9] 171}5月17日,根据整理党务案,国民党中央在全会上通过九项办法,以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9] 172}正是通过这次会议,“蒋介石从此步上了权力的极峰,军权高于党权的作法也由是开始”^{[9] 183}。其时,陈独秀仍在报刊集中论述帝国主义与军阀等,而甚少讨论国共关系,前文提及的1926年6月4日陈独秀致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又称:“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内中所载,倘都和先生所口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印刷上的错误,则我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会有几句声明的说话。”针对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上故弄玄虚地“我要讲也不能讲”,陈独秀指出:“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不必掩藏。因为先生说出后,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应该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7] 100-101}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称:“现时中国之革命势力,实在危殆至于极点。故吾两党之共同职任,即在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其内部,反抗以至于推翻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针对国民党以整理党务案的名义清党,声明指出:“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至于‘党务整理案’中,关于以后两党合作方式之问题,则吾两党本为革命联盟中之友军,可各自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7] 98-99}

实际上,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此时国民革命受到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总顾问、苏俄专家鲍罗廷的影响。据张国焘回忆整理党务案,称鲍罗廷一直认为“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面对张国焘等提出武装农民的举措,鲍罗廷予以拒绝:“一般说来,共产党不作无目的的退却。即使事实上在执行退却政策,也要坚称以退为进的借口;因为赤裸裸的退却,会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鲍罗廷当时所做的,正是如此。这还不算,他竟将‘不肯进攻’、‘不注意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头上。后来斯大林之批评陈独秀先生的机会主义,就是受鲍罗廷的影响。鲍罗廷在紧要关头,拒绝了我的武装农

民这一建议,也足以证明斯大林的批评无论如何是过分的。”^{[9] 181}

与蒋介石等重弹国民党一党主义、一个总理的论调及加紧分共的同时,陈独秀引导《向导》在批判列强与军阀上发挥了先锋作用,而对国民党逐步向右转、有严重的分裂趋向评估不足。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央政治报告,首先论述了各种社会势力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云:“在民族革命运动过程中,我们应知道各种社会势力及其趋向。现时中国社会势力,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军阀、买办、官僚、新旧士绅之反赤运动。……第二种是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者之革命运动,这是新的革命势力,刚与第一种旧的半封建势力对抗。……第三种是中小商人之反抗运动(如抗捐抗税等),犹豫怯懦的小资产阶级,固然不容易脱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之统治,而因为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压迫,他们的政治思想终比大资产阶级浪漫一点,他们对于革命运动的态度,当站在大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第四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7] 113-115}其次讨论了国民党内部之分化及共产党的态度,“国民党内部之分化正是反映上面四种社会势力。反动的右派(李福林、冯自由、马素、古应芬等),代表第一种;共产派代表第二种;左派(汪精卫、甘乃光等)代表第三种;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蒋介石等)代表第四种”。主张仍采取分化国民党及联合国民党左派等来解决问题,“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态度应该与对全国各种社会势力之政策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犹之在社会势力中我们现在还不(能)敌视资产阶级,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7] 116-117}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称:“广州三月二十日事变,民党中央五月十五日会议,黄埔军校六月七日又提出的处置共产派问题——凡此一切,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7] 119}在动员工农问题上,中共中央做了自我批评:“扩大会议认为上届(去年十月)扩大会议的宣传问题的议决案,至今实行的不及百分之一二,中央及各地宣传部是不能不负责任的。”^{[7] 128}问题是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规模清共,中国政治前进的步伐遭遇严重挫折。此语境中的报刊言路取舍远赶不上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治阴谋来得迅疾。在国民党整理党务案中蒋介石本人接

替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不久就离开了广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在1926年11月举行的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斯大林倒很重视他,似有让他代替陈独秀领导之意”^{[9] 186}。此时的陈独秀仍将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所谓左派领袖汪精卫的身上,1927年4月5日他还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为汪精卫的假革命形象所迷惑。1927年4月29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决定:应当加强中央,并把支部变为真正进行工作的组织。在党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提出这两个问题。宣传部这两年来工作,不能称作宣传工作,实际上它是做了出版工作。而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不管怎样是按期出版的,其份数也在逐渐增加。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只有7000份,而从北伐开始,已增加到5万份。”又说:“宣传部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出版工作,而不是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部没有工作计划,不给地方发通告,也不向中央报告工作。宣传材料出版得很少,而鼓动材料却很多……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坚守住,我们就在这里成立党校。我们必须出版一种党的日报,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就开始出版这种报纸。”^{[9] 362-363}问题是国民革命已经遭受严重挫折,武汉最后并没有守住。是年5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尤其强调“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9] 446-447}。夏斗寅叛变及5月21日长沙爆发马日事变之后,6月15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电共产国际,称:“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谭平山的就职演说含糊的,那是在夏斗寅刚刚叛变后发表的。国民党决定延缓解决土地问题,而先去击溃夏斗寅。谭平山作为政府的一员,未能公开为一种与国民政府的意见相左的观点辩护。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并揭露

言过其实的反动宣传,以中止军官和国民党左派间引起的恐慌,从而克服农民运动道路上的障碍。”^{[9] 468}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被停职也在情理之中。而历史悖论却是“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施行大屠杀,尽管他在短期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在许多人心目中,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1] 205}

三、国民革命与报刊舆论关系的省思

五四之后的政论性报刊常涉及共产党、国民党等,报刊的话语表述涉及政党—国家关系。近代政党—国家的政治模式涉及以党治党、以党治国的模式,这对政治家或政客而言,有个经营、运作的过程。创刊于南北军阀及新文化思潮夹缝中的《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公开出版的机关报,对北伐前后的蒋介石、汪精卫等领导的国民党有其政治评判立场,这一点显然有别于国民党的喉舌《民国日报》。1919年至1927年,中国历经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等。就共产党而言,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就国民党而言,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确立及建设的过程。它们各有自己的报刊作为喉舌或舆论平台。中共早期党报尤以陈独秀等领导下的《向导》为代表。

探究《向导》面临的政治语境可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三民主义等多极政治力量博弈来考察,而不仅仅局限于同人刊物内部阵线。国共两党主张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涉及近代社会矛盾博弈的过程,各自的刊物《向导》、《民国日报》与《努力周报》之间也存在斗争或合作的关系,且与1923—1924年、1926—1927年前后国共合作或分裂密切相关。其背后涉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指导。周锡瑞指出:“最近的学术研究认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比我们曾经所认为的要大。共产国际在中共的建立和引导其早期成员走出知识分子学会而走向革命运动并与重组后的国民党联合这一点上起到的作用已被广泛承认,毋庸置疑……我认为,尽管斯大林在1927年犯了错误,共产国际的建议总的效果是正面的”^{[1] 188}。上述观点可以讨论,但共产国际影响下的中共及其报刊在国民革命转向中的作用值得探讨。这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媒介事件—政治事件的内在勾连,问题是报刊史学层面怎么揭示这些历史事实。

在近代国共合作或分裂的语境中讨论陈独秀与中共喉舌《向导》之关系,可以有多个逻辑层次。

首先,从媒介事件与政治事件关联来看《向导》对政治运动之呼应。这涉及孙中山领导的国共合作及其病逝后蒋介石、汪精卫发动血腥的清党,共产党遭受血雨腥风,论及《向导》等报刊的政治引导,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有“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云:“《向导》是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3]306}共产党早期的宣传工作颇强调报刊的教育功能:“党的支部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我们应在每次会议注意于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以及内外宣传遇有困难的报告和讨论。并且在有些支部,宣读并讲解《党报》、《向导》都有必要。”^{[3]307}陈独秀在《向导》办报过程中发挥了领导者的角色,尤其体现在他关于时局变迁方面总结性的撰述,诸如1925年9月7日《向导》周报第128期刊发陈独秀的《〈向导〉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内称:“本报自民国十一年九月创刊以来,到现在刚刚三个周年。这三年中,中国政治经过了不少的变动,本报的革命政策之主张如何应付这些政治的变动,现在需要一个有系统的历史的叙述。”他将《向导》过去三年的变局分期总结,并称:“我们在本报未刊行以前,在发表的对于时局主张中,即已喊出‘继续民主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三个口号,所以本报刊行之始,一切政治主张都根据在这三个口号之上。”^{[8]917}针对政局变化,《向导》亦有其应变策略。陈独秀称《向导》最初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时,“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为了突出重围,陈独秀在《向导》发刊宣言上“主张集合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国民军,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同时根据这个革命的政策之理论,反对当时一切非革命的理论,如‘法统说’、‘制宪说’、‘武力统一说’、‘联省自治说’、‘整理财政澄清选举说’等”^{[8]917}。陈独秀要坚持“民主革命”之言路。在陈独秀看来,“‘民主革命’这一口号,乃在我们未刊行本报前提出的……随后,我们以为真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

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8]918}。孙中山病逝前后的国共合作、分裂有其政治语境,而这一政治语境下陈独秀与《向导》的关系,反映了政治家办报旨趣及其与政局变迁的关联,也反映了共产党走向中国政治舞台中言路的选择。

其次,可从话语表述及其政治认同层面分析。近代政治家办报涉及报刊的党化、教化等问题。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包括“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说:“第四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议决案,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其中尤以党中左的右的乖离倾向之指示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议决案指出:“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固然,大会一方面承认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动的指导地位”。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缺陷:“大会亦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尤其对于民族革命理论的解释和鼓吹,《向导》、《新青年》、《前锋》以及《党报》中的文章在第三次大会后竟因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决议文的稍欠明了,同时复为防止党中左稚病起见,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遂发生了右的乖离错误。”强调“今后本党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3]304-305}。针对复杂多变的政治时局,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相关政治报告。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认为今后宣传工作应当赶紧整顿,在提及出版物的问题时认为《向导》要重视革命实践,“如《向导》上过于偏重理论分析的论文,北京《政治生活》上的历史的理论的文章,都可以登载于《新青年》”^{[7]123}。这大体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报刊党化、舆论引导的过程中逐步熟悉报刊的政治功能并有意识地加以发掘。

总之,国民革命以孙中山病逝为历史分界线,涉及国共合作、分裂,特别是蒋介石发动三二〇反革命事件,导致国民革命转向,此语境中《向导》的政治议

题与陈独秀时评的关系,反映了陈独秀等领导下党报与其时政局变迁背后共产国际的作用之关联,也反映了共产党走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党的机关报舆论议程设置及政治精英言路的选择。^[10]

[参 考 文 献]

- [1] 董玥. 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萃[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2] 王健英.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G]. 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 [3]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1)[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4] 人民出版社. 回忆蔡和森[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5] 人民出版社. 蔡和森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6] 汪原放.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 [7]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2)[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8]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 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 [10] 李雅莉. 近代新媒介对青年学生思想观念的影响[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72-175.

Turns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Guide Weekly* and the Tendency of Chen Tu-hsiu's Political Comments

WANG Tian-gen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The sharp turns in modern politics led to extremely complicated role identity in journalists, especially those who were politicians. As the nation-party relation was facing reconstruction in early 20th century, a party as a political group had its own regulations, possessing its own fighting capacity and channels for airing views in the seizure of political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rming and breaking of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 Chen's relation with *Guide Weekly* reflected not on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rty newspapers and the transition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but also the Communist Party's choice of channels for airing views on its way to the political stage of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 revolution; Guide; Chen Tu-hsiu

[责任编辑 刘文俊]